

國立台中女子高級中學九十七學年度人文暨社會科學實驗班

專題研究成果

台灣解嚴後校園內外環境與

野百合學運成形之關聯

學生：林孟潔 撰

指導教師：劉妹言 老師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

中文摘要

本文欲以各式角度切入去審視台灣地區解嚴以降至野百合學運爆發之間的學生運動發展背景，因以學生參與所構成之學生運動作為主體，故分為校園內部環境與校園外部社會情勢作探討，藉由相關文獻的分析，再更進一步的從野百合學運之成形與開展、過程中進一步的去研究此一學運之成形與發生和台灣社會解嚴以後校園內部與外部環境變遷之關連，以求得深入的理解。

從解嚴後校園外部環境之分析中可以發現，時代與社會背景的轉變對於野百合學運之醞釀和生成有莫大的影響力，從經濟環境而言，解嚴後的台灣社會經濟高度發展，為求經濟能力發展相符的生活品質上的提升，使價值期盼與價值能力兩者間的差距能夠拉近，解嚴後的學生運動與社會運動便大量生成；從社會環境而言，台灣社會變遷改變了原有的社會環境，而社會變遷也因此間接的提供了社會運動的環境基礎；從政治環境而言，為回應人民在價值期盼上的政治參與渴求以及社會改革能迎上價值能力的提升，政府的政策相對而言更趨於開放。

從解嚴後校園內部環境之分析中可以發現，野百合學運較解嚴前的學生運動而言累積了更為充足的學生運動經驗，從動員、組織、訓練至運動的開展，歷經 1980 年代的各式議題，皆可視為野百合學運潛在之醞釀以及推力。在 1990 年與較具爭議且影響範圍擴及較大的社會議題做結合，而於焉爆發。

目次

| | |
|------------------------|-------|
| 第一章 緒論 | |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 p. 4 |
|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方法 | p. 4 |
| 第二章 解嚴後校園內外環境之分析研究 | |
| 第一節 解嚴後校園外部環境之分析 | p. 5 |
| 第二節 解嚴後校園內部環境之分析 | p. 8 |
| 第三節 解嚴後校園內部學生運動訴求方向及參與 | p. 11 |
| 第三章 野百合學運之歷史發展研究 | |
| 第一節 野百合學運之學生主體性與社會支持 | p. 14 |
| 第二節 野百合學運的爆發與事件經過流程 | p. 16 |
| 第三節 野百合學運的四大訴求 | p. 20 |
| 第四章 結論 | p. 22 |
| 參考文獻 | p. 24 |

台灣解嚴後校園內外環境與野百合學運成形之關聯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綜觀台灣學生運動史，因其特殊的政治環境與具高度複雜性的歷史背景，使台灣的學生運動樣貌自成一格。而台灣的學生運動除了與校園內部的環境轉變有所關連以外，更與校園外部的社會環境變遷及脈動息息相關。而在台灣，無論是校園內或者是校園外的環境，其所產生最重大的變遷主要關鍵性的決定因素，即為台灣在 1987 年解除了自國民政府遷台後長達 38 年的戒嚴體制，至此，台灣社會無論在民主政治的發展、社會風氣的開放與經濟環境上都有極大幅度的變遷。

而學生運動作為一學生主體意識與理念的呈現方式，在解嚴後的台灣社會，學生運動除了為爭取自身權益而發聲，更有為數不少者反映了當時社會上所關注的改革議題，並進行學運團體間的組織和動員，將學生力量與社會潮流相匯聚，進而向政府施壓並要求改革，在解嚴後的台灣社會扮演極重要的角色。本文即以其中最具關鍵性並促使台灣民主政治躍進的 1990 年野百合學運作為觀察對象，以各式角度切入去審視台灣地區解嚴以降至野百合學運爆發之間的學生運動發展背景，因以學生參與所構成之學生運動作為主體，故分為校園內部環境與校園外部社會情勢作探討，再進一步的去研究此一學運之成形與發生和台灣社會解嚴以後校園內部與外部環境變遷之關連，以求得深入的理解。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方法

野百合學運本身具有多元的面向，可由多方面的角度與觀點切入，本研究即以解嚴後台灣學生運動蓬勃生成的時代背景研析與野百合學運之起因、成形和發展過程為主體，藉由文獻分析的方式進行研究，收集與野百合學運相關、涉及解嚴以後台灣校園內部與社會情勢研究分析之文獻資料，進行研究及探討，試圖從中釐清野百合學運的發展過程，與此學運發生前從解嚴後之整體時代背景、社會環境對於學生運動所產生的影響，透過探討與分析，得到進一步的瞭解，以作出整合性的分析。

第二章 解嚴後校園內外環境之分析研究

第一節 解嚴後校園外部環境之分析

1987 年中華民國政府解除實施長達 38 年的戒嚴令，台灣地區無論是在民主政治的發展、政治參與、社會風氣、意識形態價值與經濟結構上，都有了很大的轉變。而其後校園外的社會因解嚴而使昔日由政治力與經濟力所主導的生活環境產生極大的變遷，民間的社會力量逐漸匯聚並以社會運動或反對運動的形式展現，更成爲一直接影響校園內部學生運動萌生至興蓬勃發展的重要因素。

本節欲從該時代之政治面、社會面、以及校園內部環境等不同的剖面進一步去分析並且試圖理解，實際影響學生運動成形的諸多因素。

一、經濟環境分析

至台灣解嚴的 1987 年，台灣的經濟情況一路快速且穩定的成長，國民所得提高，在物質生活上也越趨完善，然而爲何在解嚴過後，台灣地區的學生運動卻不增反減？以經濟的觀點出發探討其成因茲分述如下：

經由數十年來的發展，高承恕曾在對於台灣新興社會運動結構之因素的探討篇章中指出，台灣經濟結構的變遷提供了社會變遷的基礎¹，綜觀此一時期眾多新興的社會運動的崛起與發展，大抵上而言這些運動的本質皆不全然以「求生存」的目的出發，相對手段更激烈的運動形式而言，便較不具有革命性如欲推翻政權等激烈的意識形態色彩，這些運動的目的大多呈現一種「求生活合理化」的偏向性，如婦女運動、環保運動、勞工運動乃至於本文所欲探討的學生運動，皆有此一偏向性隱含其中。這些運動針對既有體制制度化的結構存在這某種程度上的不滿，而這些不滿透過行動者轉化成具體行動時，便匯聚成爲一股行動力，使目的改革之制度化結構進行反省與革新，透過集體的力量加以改變原先不合理結構，使之朝他們認爲較合理的方向去做改變。此種現象也可在由陳國興所提出的：開發中國家的後期階段，國內經濟繁榮，帶動人民福利價值提升，人民參與感相對地增加，此時如果該國政治制度不能配合經濟發展，人民價值能力可能會下降，但參與的價值期望卻持續上升²，得到印證。

因根基於台灣已逐漸發展穩健的經濟結構作爲支撐，這些運動便不單只是在「生存」的層次上去爭取，而更進一步的主要是在「生活」上的層次去力求改善。在此意義上而言，社會運動乃至於學生運動，並不必然源於某種「危機」的情境裡而產生，反而是當生存條件有了相當經濟基礎作爲後盾之後，而立基於此一基礎上反省現有基礎的不足與不合理性。

¹ 高承恕，「台灣新興社會運動結構因素之探討」，徐正光、宋文里合編，(台北：巨流圖書公司，民國 79 年，一版)，頁 11。

² 陳國興：「警察鎮暴原理及其對策之研究——從集體行爲理論之觀點探索」，中央警官學校出版，頁 267。

台灣經濟繁榮所帶來的現代化的過程，也加速了都市化、工業化、教育的普及與社會流動等，也在解嚴開放後間接的構成了各式新興團體，使各式各樣的組織相繼設立，這些現象均促使公民自覺意識的崛起與參與政治事務的觀念日漸普遍，進而加速提升人民對於政治活動的參與。

在平均國民所得已將近一萬美元的台灣社會，為追求與經濟能力發展相符的生活品質上的提升，意即使價值期盼與價值能力兩者間的差距能夠拉近，解嚴過後的學生運動與社會運動便由此開始醞釀。

二、社會環境分析

承上所述之解嚴後台灣社會經濟環境的分析可以得知，經濟持續性的高度發展可以使普遍人民的生活環境富裕化，而建立在經濟狀況快速發展此一條件之上，隨之而來的社會變遷便大幅度的改變了既有的台灣社會環境。

因工業化與都市化的緣故，造成人口的高流動性以及職業、階層上的區分多樣化；而隨著教育與傳播媒體的普及，人民的知識水準也大大的提升。以上的諸多變遷造成了社會結構的轉變，人民對於自身權益開始越加的重視，再加上對於公共事務的參與欲求進而表現在對於自由與民主開放的呼聲上，而這些民意的匯聚也反映在解嚴後學生運動的訴求之上，藉由學生運動的理念來呈現。

上述台灣在解嚴與經濟高度發展後無論是在物質生活、社會結構抑或是價值觀與內涵上的巨變，如台灣社會由農業社會轉為工商社會、人口急遽成長、都市化、工業化等，不但使中產階級族群擴大，也促使了社會自主意識形成，形成推動社會轉型的主力。有學者稱之為台灣社會多元化的歷程。社會變遷改變了原有的社會環境，而社會變遷也因此間接的提供了社會運動的環境基礎。

在林嘉誠的看法上，更可以進一步的理解社會運動所受社會環境的變遷之影響。

台灣地區目前不可抗拒的社會運動潮，其實是過去四十年社會變遷的必然結果，正如前段所述，不同類型的社會運動均受所處環境的左右，社會變遷所產生的教育普及化、中產階級崛起、政治結構的民主化、民眾權利意識與需求提高、人口集中都市、外來文化的流入、大眾傳播發達、民主心態與政治參與升高，社會團體林立、職業多元化等現象，提供了社會運動的環境基礎。³

三、政治環境分析

自民國三十八年至七十六年的戒嚴體制解除以後，政治體制產生了劇烈的變革，而學生運動也乘著此一波浪潮使整個政經體制結構上的改變抵最高點，若要進一步探究學生運動與

³ 林嘉誠，「台灣社會變遷與社會運動」中國論壇，第 282 期，頁 31。

政治結構的轉變間是否存在著某種關聯性，可以依據學生運動大量產生的時間點來作觀察。異於台灣過去受國民黨政府操控箝制所產生的愛國學生運動，此一時期大部分由學生自主性發起的學生運動皆於解嚴之後產生，且訴求大多篇向政治面，如反軍人干政、解散國民大會、廢除刑法 100 條、反政治迫害等議題，由此便可見學生運動與政治結構轉變之相關性。

由以下蕭新煌的觀點更可以理解政治情況與社會結構上根本性的關聯。

一旦解嚴和政黨組織合法化之後，對現有的社會結構及其動態發展自當有其不可忽視的衝擊。「解嚴」在社會結構上的深層意義，就是「政治力」的主宰支配性格「依法」下降，而「社會力」的自主性格「依法」得到進一步的保障與發展；原本緩緩在夾縫中衝出一條生命力的社會參與和改革求變過程，在解嚴之後也應該因為可以獲得較多而公開的「資源」而得以日趨成熟化。⁴

由上述可知，社會以及政治環境的變遷提供了社會改革的基礎，在政治力與社會力彼此之間相互擺盪，使得舊有主宰台灣政治環境的政治力影響相對下降，並在解嚴後漸進的使社會力的自主性提升，獲得更多公開發聲的機會與資源。在各式興起的社會運動之中，因學生運動的高度理想呈現以及不受利益牽涉與操控的特質，促使屬社會力之一之學生運動的發生更具可行性。此部份於後面篇章有更進一步的說明。而追求民主的呼聲更在解嚴後大規模的野百合學運中被呈現，換言之，在此一時期間所形成的運動本身的自主性，必然會影響甚至促進各式的社會運動乃至學生運動的生成，由以上的探討便可知學生運動與客觀政治環境必然存在著某種程度上的相關性。

透過以下徐正光的一些觀察或許更有助於理解此一時期的政治環境背景。

要了解 80 年代，台灣社會運動的本質以及其所蘊含的意義，我們不能不從其所處的歷史和結構條件下來觀察。主導 50 年代到 80 年代台灣社會的結構性力量，一是國民黨所建構的威權體制……

社會運動在 1980 年代之前不能在台灣發展，與上述的政治支配體制的嚴密控制有密切關係，而八零年代社會運動得以滋長發展，則可以看作是這種支配體制受到挑戰，乃至於鬆動的結果。⁵

而此一時期的台灣正處於一政經轉型階段，國民所得逐年增加，而為回應人民在價值期盼上的政治參與以及社會改革能迎上價值能力的提升，政府的政策並更趨於開放，在此一環境下，上述的學生運動發展立基與模式便更為蓬勃興盛。

⁴ 蕭新煌，「『破蛹』後的社會思考」，1986 年台灣社會批判—自力救濟，(台北：敦理出版社，民國七十六年)，頁 31~32。

⁵ 徐正光，「社會運動的理性操作」(時報文教基金會「社會重建」學術研討會，民國七十九年八月)，頁 31~32。

第二節 解嚴後校園內部環境之分析

1980 年代初期的校園環境並與 1960-1970 年代並不存在著太大的相異性。其校園內的風氣保守僵化，上自行政決策者下至教授群，主政者作風仍然擺脫不了官僚化、教學部份依舊殘存著黨化教育雕鏤的痕跡、依循教材死守中國化的模式。國民黨政府透過特務機構、軍訓人員、救國團以及職業學生全面性的掌控學生在校園內的活動以及意識型態上的形塑。

但隨著日漸興起開放的社會環境風氣，校園內自然也不可能置外於社會風氣變革、人民意識崛起要求自身權利、對於政府的諸多限制所侵害人民權利的作為提出抵制等等的影響。由劉仁傑的這段說明便可略見端倪。

從 1980 年代末期開始，台灣社會就歷經劇烈的變動：解嚴、解除報禁、黨禁，民間活力四起、各種社會運動蓬勃發展。台灣各地瀰漫著一種騷動隨時而出、不安於室的氛圍。這股澎湃、新生的風潮，自然而然地也蔓延到校園內，使校園成為聚積社會能量的一個重要場域。

6

而這股校園內學生力量的匯聚更轉化成實踐並且引發 1980 年代中後期諸如 1982-1988 年台大代聯會主席普選風波、1985 年李文忠事件以及 1986-1987 年台大「自由之愛」等校園內的小規模學生抗議事件。甚至將學生的反對力量延伸至校園外，結合當時的社會議題加以發揮學生的力量，開始走出校園、關心並且批判社會，如 1986 年的鹿港反杜邦事件。

而如何透過集結去展現並且發揮學生的力量，與 1980 年代中後期校園內的環境有極大的關係。如前文所述，經歷了以 1980 年代前期包含 1986 年國民黨政府實施政治自由化之前，沉寂僵化的大學校園，在時代的移轉以及學生意識的自我崛起後，便可以從校園內的學生集結與大學校園、大學生族群來剖析解嚴後的校園內部環境。以下便由校園內較具革命意識、抗議色彩的社團集結以及教授群、學生在此時期之中所受到思維上的衝擊與改革等部分，來分析當時的校園內部環境。

1. 1986 年後校園內較具革命意識與抗議色彩的社團

北部地區：台大大陸社、台大三民主義研究社、台大大學新聞社、台大大學論壇社、台大濁水溪社、政大青年社、北醫抗體、北醫噬菌體、輔大創造社、淡江南淡水、中央怒濤、文化 260 等。

中部地區：中興法商春雷社、中興法商青年社、東海東風社、東海東潮、東海新聞社等。

南部地區：成大西格瑪社、成大經緯社、高醫人文社會研習社、高醫望春風等。

集結性組織聯盟：全國學生自治幹部聯誼會(學自聯)、全國學生運動聯盟籌備會(全學聯)、全民反政治迫害運動聯盟(全民聯)、台大代聯會等。⁷

⁶林仁傑，一段跨時代的故事：台灣學生運動史研究（1920-199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 92，頁 137。

⁷鄧丕雲，《八〇年代臺灣學生運動史》，頁 104。

透過上列的解嚴後校園內較具革命意識、抗議色彩的社團的呈現，可以發現其中以北部地區最為密集，而北部地區更以台灣大學為解嚴後台灣學生運動最蓬勃興盛之發展中樞。學生運動社團的密集遍布也是往後野百合學運發生場域位於台北市中心地帶的因素之一。透過這些思想性、較偏向革命性抗議模式的學生社團，學生能夠透過特定取向性之書籍閱讀以接觸各式各樣的思考模式訓練與思維衝擊，進而累積並且內化成為自身的一部分，再透過集體式的集結，進而將個人力量匯聚，成為往後造就野百合學運推波助瀾至頂點的背後潛在力量。

彭琳淞透過針對此類學生團體平時讀書會的閱讀刊物及內容，做了以下的分析。更可以進一步的與此部份筆者欲說明的解嚴後校園內部生態環境之闡釋相互對應。

1. 就關心的方向而言：

主要指向對台灣社會運作邏輯的了解，因此台灣社會發展史和資本主義深化後的社會現象解析，是兩個重點，近年來頗為學生關切的大學自治和憲政改革議題，都曾經是其關懷過的主題。

2. 就閱讀的內容而言：

首先以從人文主義的立場出發，嚴厲抨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於人本扭曲的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是最多被各校思想性社團採用的馬克思原典。……有關文化批判的理論，此一思潮是期望能在文化的領域，回覆人們的主體性。……思想與理論上的知識，經轉化成個人意識的一部分後，就無法從一般的表徵中去發覺，換言之，它已內化成個人主觀意識的一部分，藉由此意識的影響，而成為個人行動的準則，這是我們首先也應該知道的。⁸

由此可知學生對於理論的內化以致而後的思考轉化為行動的啓蒙上，在解嚴後得到了相當充足的養分，在校園環境的體制內培養並且深植許多學生的思想，進而成為個人行動的準則。

學生在研讀的書籍內容從左派思潮至台灣歷史與文化批判理論等，藉由此一時期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的學生社團作為媒介，培養出學生對於現實社會的批判與追求改革的能力，更進一步的延伸引發 1986 年後各地小規模的學生運動，以致在 1990 年 3 月將一切的運動情勢推至頂點的野百合學運爆發。

在教師教授群方面，校園民主化政策開展之後便出現各式的組織及協會，進行目的各異的人民權利爭取、改革促進、推動校園與台灣社會民主化的各式以改革作為訴求之運動。此類團體如：台灣教授協會、大學教育改革促進會、澄社、台灣教師人權促進會等。

教授群在校園場域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示範意義，而其對於社會現況的批判或認同以

⁸彭琳淞，《政府遷台後台灣學生運動變遷之探討—以四個重要因素之互動關係》(台中：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1988)，頁 81。

及其作為、態度、理念，更透過教學以及言教、身教等傳遞出來，進而對學生產生程度不一的影響。而其所投入參與的社會議題改革運動更具示範號召的作用，使學生在以自身為主體發起各式運動時，在某種程度上將教授群視為背後提供建議與參考的重要諮詢對象，或與學生一起參與運動。在後面篇章的野百合學運事件發展流程中更不難發現，教授群的角色在學生運動之中的確發揮了不小的影響力。

綜觀解嚴後學生運動參與者發起的校園自由民主運動，在經過了學生的努力之後，使得校園逐漸擺脫政府監控、黨化教育的枷鎖，進而使追求校園民主自由乃至於擴及成為追求台灣社會的自由民主化，有著不可抹滅的歷史意義，也使大學校園成為一連串思想革命、活動開展的根據地。

第三節 解嚴後校園內部學生運動訴求方向及參與

1980年代初期，台灣校園內部生態環境背景並不遠離於國民黨政府長期以來對校園的高壓控制手段，其中包含了制式化且保守的教學體制與黨化教育的徹底實施、政府透過職業學生與軍訓、特務人員在大學校園裡長期的實施思想上的監控與管制、校方對學生集結之社團組織等的高度關切和限制、對學生出版刊物的諸多不合理要求以及審稿制度。這樣的狀況一直持續存在至解嚴後初期，校園內部面對戒嚴時期諸多政府與校方對大學校園內部的箝制之態度和思考方向上，開始有了改變，探究其因素自然與大學校園受到校園外部台灣社會變遷與社會運動大量興起之風氣影響有所關聯，使得台灣地區自解嚴後乃成為台灣學生運動相當蓬勃興盛的一段時間，再加上對於當時社會上以及校園內部存在的諸多問題所提出的抗議和發聲，使台灣學生運動之興起更為波濤洶湧。

而在諸多的學生運動與抗爭事件之中最具代表性者，莫過於1990年三月的野百合學運。⁹就單一學生運動之影響力與代表性而言，野百合學運對現今的台灣社會民主政治之發展意義重大。本節所欲探討的即為此學運發生之醞釀的時代背景，以及解嚴前後學生運動之訴求方向和參與情形。

解嚴後初期之學生運動類型的分野可以參考劉一德，早期主張學生投入校外政治參與者之〈學生運動的兩條路線〉，作為當時不少學生運動參與者的想法。裡面提及兩類，分別關於劉所認定的學生運動模式：

學生運動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校園民主運動，一類是學生政治運動。校園民主運動大致上是學生因為關心自己生活事物而做的抗爭活動……不過他的抗爭性比較低……議題一旦解決，運動就不見了。

學生政治運動，則是一群經過政治覺醒的學生，為了宣傳他們的信仰，擴大力量，而進行組織宣傳活動和反抗活動……因此，國民黨也壓制最厲害。¹⁰

但當時許多的學生對於各式議題之參與熱衷程度仍無法徹底擺脫尚未解嚴之前，1950-1970年代之「絕大多數學生對於社會議題的冷淡」的狀況，除了少部分積極參與黨外社會改革運動活動的學生之外，大多數的學生對於當時校園內部固有的黨軍政控制大學校園、不合理的嚴格審稿制度等問題，乃至於整個社會內部所關切之「萬年國會」、憲政體制改革等議題，仍舊保持略知一二或者停留於關心的階段，就整個大學生的自覺意識與參與學生運動的比例上而言仍未普及。

而造成此一狀況之因素另一方面也與長年戒嚴以來政治制度的不合理，與政府強制的介入控管社會情勢，進而在校園內也以威權管理的方式進行管制的背景因素相關。多數學生順應了校方與政府方面的政策與思維模式，甚至接受了單一的意識形態灌輸，如與政府立場一致的三民主義教材作為教學使用等，再加上校園內對異議學生份子的壓制，久而久之，大部

⁹又稱三月學運，1990.3.16~1990.3.22。

¹⁰劉一德，〈學生運動的兩條路線〉，收入范雲編，《新生代的自我追尋—台灣學生運動文獻彙編》，頁94-95。左又新為作者筆名。

分的學生在對於社會議題的認知和參與便相對薄弱許多。

但在當時仍然存在著不少如上一節所提及，對於校園內部乃至於社會上的種種問題有所瞭解並試圖發揮自身力量去發聲之高自覺意識的學生，組成學生運動的抗議、發聲團體進而將這樣的覺醒意識推展延伸，漸進的去影響當時大多數的學生的思考與行爲，更爲了和當時與黨外勢力聯繫甚爲緊密切的少數激進派學生做切割，避免使學生間接認爲學生運動即爲黨外勢力之延伸，而使往後的學生運動參與者及主事者，特別注重與黨外、在野黨勢力的界線分隔，不願與任何特定單一的政黨或勢力作結合，以保持學生運動以學生作爲主體之自主性與獨立性。

直至 1988 年之前，校園自由化並未徹底的落實在校園的場域之內，校園此一場域仍處於政府所限制的特別權力關係的規範底下，以致於前述諸如政府透過職業學生與軍訓、特務人員在大學校園裡實施思想上的監控與管制、校方對學生集結之社團組織等的高度關切和限制、對學生出版刊物的諸多不合理的要求及審稿制度等等的現象仍然續存在。解嚴後初期，透過比例上相對少數之對民主化、自由化與學生自身權益維護具有高度自覺意識的學生，藉由規模較小的學生運動，加以碰撞並且試探體制的限度，一次次的激起了其他大多數仍未具備維護自身權益之自覺意識的學生，針對這些校園內外問題的注目與進一步的理解的動力；這些少數學生更進行了串聯和組織，使解嚴之後台灣的學運系統形成一套有效的動員網絡。並且開啓解嚴以後一連串的學生運動，有效的以漸進式的方式將此種學生自覺意識進行傳播和擴散，直至 1988 年時校園自由化的制度展開，使得大多數的學生開始較爲積極的關心所身處的校園內部與外部台灣社會潛在的問題以及必須被改革的部份。解嚴之後規模不一的學生運動激發了當時大學學生對自身權益相關議題，以及當時社會議題的關心和對學生運動參與的熱情，進而扭轉長期戒嚴以來大學學生對校園內之潛在問題和校園外政治議題冷漠狀況。

而此一時期學生運動的訴求方向移動更如林玉体在 1987 年所提及的，學運應該以校園內部事務爲優先、再進而將焦點擴大到校園以外的看法：

目前國內教育問題仍存在很多缺失，學生運動在此情形下應該單純化，以校園內的問題爲運動核心，譬如師資教材的檢討、學生刊物的審理、考試制度，乃至校方行政當局的心態與制度都應該列入檢討對象，這些改革如果不由學生來發動，其他角色恐怕未必更合適，校園事務可以說是學生運動的首要。

當然，國內參與社會事務毋寧也是正常的，……今後台灣的學生運動除了以校園內改革爲優先外，對校園外社會參與多多關心，也是值得鼓勵的。¹¹

解嚴後學生運動的萌生也並非偶然：

學生運動無疑是一股民間崛起的力量，它是民間力量與國民黨控制體系互動過程的一部分，而不是結果。1986-1987 年台灣學生運動的興起，是學生對國民黨校園控制的自發性反抗，所形成的結果是校園控制的鬆動，或者說是校園的自由化。¹²

以鄧丕雲的這段話或許可以對於針對解嚴後所興起的學生運動中表述的「社會力」一詞

¹¹ 〈學生運動與勞工運動座談會〉，《中國論壇》，24 卷 3 期(1987.5.10)，頁 17。

¹² 鄧丕雲，《八〇年代臺灣學生運動史》，頁 59。

提出解釋。所謂的「社會力」即為社會內部人民力量的集體伸張，並與「政治力」、「經濟力」彼此互相交盪。而在校園內「社會力」的表現方式便與校園自由化、和政治自由化與社會的開放程度三者間有密切的關連。

隨著解嚴台灣社會的日漸開放，國民黨政府不得不放寬對於社會與校園內部的控制。戒嚴時代政府所鋪設的嚴密的控制網與官僚體系，隨著台灣經濟成長所形成的中產勢力階級、市民社會的基形浮現，而人民的政治參與意識以及反對不合理之權威壓制的覺醒與自主意識也日漸高張。

有鑑於此，國民黨政府從 1986 年開始開展政治自由化的政策，漸漸的消除特別權力關係的強力社會控制。1986-1987 年台灣學生運動的興起，便是大學學生對於國民黨政府的校園控制表達不滿的一種抵抗方式，一種校園自發性的行動，運動範圍也大都集中於與學生本身相關的議題，一直到 1988 年起，校園自由化的制度才於焉展開。而在此之後，結合校園外的行動才與學運有所結合，政治自由化後的社會開放，提供學生運動在校園以外更寬闊的發展空間及可能，校園自由化更進一步的促使學生運動除了關心校園內的學生議題以外，也參與了校園外社會議題的自由空間。

基於國民黨政府相對而言的大舉放寬壓制，大環境的外在變化更使原本對政府管制有所顧忌的學生運動風險大大的降低，而使當時的學生運動成爲一個較爲普遍的社會現象而非單一孤立的零星事件。

針對 1980 年代初期，即解嚴之前台灣學生運動的發生背景，可以用彭琳淞在對於台灣學生運動的定位之討論的部分，做反面的推論以對解嚴後的校園時代背景進行分析。

從過去的發展來看，台灣學生運動長期以來一直受到校園控制機制與外在政治環境的影響。……原本大學理念與學生角色中有利集體行動產生的因素，並未明顯展現出來；反而，政治勢力（國民黨勢力）的全面介入，不但消弱了集體行動產生的可能性，也把可能產生的行動轉化（主導）到有利體制的方向上；而相較於校園控制機制有效運作的不利影響，原本不利學生集體行動產生的因素，也就顯得沒什麼重要。¹³

由彭琳淞的結論可以看出野百合學運發生前解嚴之前的時期，台灣學生運動最主要的壓制力量——政治力的介入，產生了時效長久且效力深遠的箝制力量，也大大的消弱了集體行動產生的可能性，反面而言也意即，若去除掉政治力的影響和箝制，集體行動產生的可能性便會大大的提升。這樣的推論便印證了台灣社會至 1987 年解嚴以後，政府因應時代的潮流與人民主體意識的崛起而有限度的展開政治自由化的政策，並因校園內部的自由化尙未完全徹底執行，而使得在 1988 年以前校園場域未開放的侷限及壓抑，成爲促使學生對政府當局展開反制與抗議發聲的重要因素，此階段內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更是後來促發野百合學運成熟關鍵的前置學生運動經驗累積的過程，以及極爲重要的一段歷程。

¹³ 彭琳淞，《政府遷台後台灣學生運動變遷之探討——以四個重要因素之互動關係》（台中：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1988）

第三章 野百合學運之歷史發展研究

第一節 野百合學運之學生主體性與社會支持

1990年三月的野百合學運¹⁴作為1980年代以降參與學生最多、維持抗爭時間最長、引起社會關注最高的一場學生運動，並且對台灣社會的自由民主發展與憲政改革產生了關鍵性的影響力。¹⁵在台灣學生運動史裡佔有一席之地與無庸置疑的代表性。

將野百合學運置入於1980年代的時代背景來觀察，該學運的爆發點為抗議「萬年國會」即對資深國大代表的選舉方式的不滿¹⁶，即匯聚了當時整個台灣社會對資深國民大會代表濫權的不滿與批評、要求資深中央民意代表退職以建立合理政治結構等的要求之上，進而衍伸至野百合學運爆發後的四大訴求的形成：

1. 解散國民大會，重建一元化的國民大會制度。
2. 廢除臨時條款，重建新的憲法秩序。
3. 召開國是會議，全民共謀體制危機的解決。
4. 提出民主改革時間表，呼應民意的潮流。¹⁷

四點訴求中最主要的核心意義即為反對國民大會過於集中的權限¹⁸，以及國大代表因動員戡亂臨時條款實施而長達45年從未改選¹⁹，缺乏民意的支持間接造成國民黨把持國大的諸多權力，再加上動員戡亂體制對人民的種種壓制，戒嚴後整體台灣社會的不滿與憤怒，便藉由野百合學運宣洩而出。

在當時，台灣省議會更以撥款、調派車輛與要求省政府指派省立醫院人員加入廣場救護站照顧學生等具體行動支持中正紀念堂的學生，省議會駐會委員會還希望最高當局重視學生所提出的四點訴求，並予以具體行動說明，建議政府立刻召開國是會議。²⁰以民選作為民意基礎的省議員所構成的議會此舉，顯示出了此場學運擁有部分民意基礎以及當時台灣社會人民肯定的依據之一。

而野百合學運之所以能夠在台灣社會裡引發關注並獲得多數民眾普遍性的支持，十分重要的一個因素即為野百合學運堅持以學生作為發動、進行抗爭的主體，並且堅持學生的自主運作，而不與特定利益糾葛，不涉及任何權力的爭奪。但也因此不得不在學運裡以有形的糾察線將學生的身分與他者顯而易見的做區分，以防止有心人士的滲透與侵入。在鄧丕雲所著

¹⁴ 又稱三月學運，1990.3.16~1990.3.22。

¹⁵ 此指李登輝總統依照其對學生的承諾，在不久後召開國是會議，另一方面也在1991年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結束「萬年國會」的運作，台灣的民主化工程從此進入另一嶄新紀元。

¹⁶ 鄧丕雲，《八〇年代臺灣學生運動史》，頁292。

¹⁷ 全國學生自治組織，〈同學們！歷史在號召著我們！（1990年3月19日），收入林美娜編，憤怒的野百合：三一六中正堂學生靜坐記實〉。

¹⁸ 中華民國憲法之父張君勱依據孫中山的理論，批判「國民大會」之設計並非直接民權，而認為應將國民大會無形化，「全國公民直接行使四權，名之曰國民大會」。薛化元，《民主憲政與民族主義的辯證發展——張君勱思想研究》（台北：稻禾出版社，民國82年）。

¹⁹ 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任期自1947年至1992年。

²⁰ 〈撥款20萬元/派車/促省政府設醫療站/省議會搭上「聲援列車」〉，《聯合報》（台北），1990.3.21，4版。

的《八〇年代臺灣學生運動史》中明確的指出此一學生身分的代表性之特性。

(三月學運)不受外力操縱的自主運作，使得三月學運發揮出學運前所未有的威力，令人感覺到學生是可以成為一股獨立社會力量。²¹由於三月學運是由全民的力量所支撐，(學生身分)身分制也因此轉化成代表的概念，學生的身分變成全民的代表與理想的代表，客觀上可辨識的界線轉化成含有主觀上抽象的認同概念。²²

透過上述可以瞭解到學生運動的理想性與不被政黨或者其他利益團體操控與利用的獨立理想社會力量，進而成為全體人民的寄託。國民大會代表的濫權所侵害的，是全體台灣人民的權益，而野百合學運即針對國大代表的利益爭奪進行否定，故抗議者的本身需具有超越利益糾葛與具有(相對而言)較高的理想道德，才能夠作為當時台灣社會反對此一情形的代表。

在整個社會的族群分類裡，唯有學生因仍未屬於特定社會階層與屬性，在普遍大眾認知的形象上較能與上述超越現實利益糾葛的特性相符合，也因此成為整體台灣社會之中具有較純粹的理想性與道德的代表，作為反應社會民意的主體。

當時的大專院校學生串聯組織民學聯提出了〈不要讓我們成為民主殿堂的缺席者〉聲明²³，訴求：

1. 暫時凍結中華民國憲法，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
2. 迅速建立台灣第二共和，還政於民，重建憲政。
3. 李登輝立即提出政經改革時間表。
4. 盼望全島學生、教師、市民，不分男女、不分黨派、不分省籍，共同參與中正紀念堂前的學生靜坐運動。²⁴

此份聲明呼籲台灣人民對野百合學運積極共同的參與，而事實上，野百合學運也獲得全國民眾與各校學生的大力支持，從一開始3月16日傍晚靜坐的一、二十人持續成長直至3月19日傍晚超過三千人²⁵，更可以看出野百合學運在短時間內巨大的影響力與群眾動員的力量。

支撐野百合學運的背後力量不單單來自學生本身，而是來自當時整個台灣社會，從社會大量的物資支援、媒體大篇幅與長時日的報導和肯定、及廣場上的雖不具有學生生份但仍積極參與的民眾，這些都表示了整個台灣社會對於學運的支持，而這些社會支持也建立於前述分析中，因以學生作為普遍民意反對議題的發聲主體，不涉及利益糾葛與具備純粹的理想和道德而匯聚。

²¹鄧丕雲，《八〇年代臺灣學生運動史》，頁300。

²²鄧丕雲，《八〇年代臺灣學生運動史》，頁301。

²³1990.3.17 清晨。

²⁴何金山、官鴻志、張麗伽、郭承啓合著，《台北學運：1990.3.16-3.22》，頁39。

²⁵鄧丕雲，《八〇年代臺灣學生運動史》，頁309、319。

第二節 野百合學運的爆發與事件經過流程

1990年，由於國民黨內部對李登輝所採用的副總統人選與決策方式產生歧見，而爆發國民黨領導階層大規模權力鬥爭的表面化²⁶，自1990年2月一直持續到3月初，引起了台灣社會人心的動盪與倉皇不安。1990年2月28日，國民大會主席團連夜召開會議，通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修正案提案，且在修正案裡皆出現「國民大會每年自行集會一次」²⁷的條文，並通過國大的第八次會議，增額支付出席國大代表的出席費。

為此，3月8日台大學生會出面邀請部分社會運動團體共同會商危機應對之政策。台大學生會的想法是希望發起停止總統副總統選舉的運動、反對由沒有民意基礎的資深國代選舉正副總統，並且主張在停止選舉及國民大會會期後，召開制憲會議訂定新憲法，再選舉總統。當天會議達成初步共識，決定以「還政於民，重建憲政」為基調，計畫在3月18日在中正紀念堂舉辦「三一八全民民主大會」。

3月9日國民黨高層政爭出現大幅的轉變，原為總統選舉的參選人宣佈退選，張忠棟也致電與台大學生會連絡，表明因林洋港的退選，政治危機已解除，因而取消318的群眾大會。3月10日蔣緯國也宣佈退選，政爭因而得以完全平息。²⁸

但學運與社運團體對於新成形的政治局勢並未達成共識，3月11日學生與社運團體召開記者會，聯合簽署發表了〈還政於民，重建憲政——社會團體對當前政局的聯合聲明〉，強調：「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是妨礙民主發展的最大障礙」、批評國大日前的擴權行為：

國民大會集會近一個月來，已經提出了無數損害人民、破壞憲政的提案，舉其大者，

1. 將動員戡亂時期終止之權由總統移轉至國民大會，企圖永久化日前的「臨時體制」。
2. 行使兩權，將國會重心由立法院移轉至國民大會。
3. 設置大陸代表(全國代表)，製造台灣內部的人民分裂。
- 4 每年集會一次，破壞憲政體制。

並且訴求：

1. 李總統立即宣布中止動員戡亂時期
2. 廢除臨時條款
3. 解散國民大會
4. 召開國是會議

此四項對國民黨政府的基本訴求也在日後發展成為野百合學運的主要訴求。

3月13日，4位台大學生在校門口燒掉國民黨黨證，3月14日，「台大民主學生聯盟」前往國民黨抗議，要求制憲，解散國民大會成為當時學運及社運團體對國民黨政府的主要訴求。

314的行動把因政爭平息後不同的運動策略思考的學運團體，重新找到匯聚點。採用行動抗爭與校園運動啓蒙兩種不同策略的學運團體由分別行動，開始走向整合，兩線並行再整

²⁶鄧丕雲，《八〇年代臺灣學生運動史》，頁304。

²⁷〈國大每年集會一次擴權訴求/老少國代默契十足〉，《台灣時報》(台北)，1990年3月1日，3版。

²⁸鄧丕雲，《八〇年代臺灣學生運動史》，頁305。

合，使學生在行動及動員上都進入戰鬥位置，這是為什麼臨時起意的 316 靜坐能夠持續並擴大的主要原因。²⁹

3 月 16 日傍晚，台大學生周克任、楊弘任及何宗憲等人自行前往中正紀念堂靜坐，並拉起布條上面寫著：「同胞們，我們怎能再容忍七百個皇帝的壓榨！」，並發送〈起來，福爾摩莎的主人！〉傳單：

我們搖籃的美麗島，是母親溫暖的懷抱
驕傲的祖先正正視著，正視著我們的腳步

我們是該仔細想想了。二次大戰結束後，德國的新生代質疑他們的祖先，唾棄他們縱容希特勒的法西斯政權。90 年代的我們呢？如果不把心中的不滿集結為具體力量，為民主改革注入動力的話，恐怕也將成為歷史的罪人了！……

他們一再重複的叮嚀，不要忘記不要忘記
他們一再重複的叮嚀，篳路藍縷以啟山林

站出來吧，身為主人的我們！如果你是學生，請您秉著讀書人的良知來吧……³⁰

外界通常將 3 月 16 日這天視為野百合學運的開始日期，因此也稱之為三月學運。

3 月 17 日，3 月 16 日周克任等人的靜坐事件訊息陸續透過學運網絡而陸續傳送出去，並使部分學運以及社運團體和記者到場，並且設立廣場組織。17 日下午各學運團體再度會商，討論面對局勢變化時所應產生的共同態度，以及對原先由台大聯盟籌畫的 319 學生罷課、總統府靜坐的行動。不過許多學校已承諾對 319 行動的全力動員。學運發展至此已蓄勢待發。全國各地幾乎都傳出要求未改選的國大代表辭職的聲浪：文化大學學生組成民主聯盟，於 3 月 15 日前往中山樓抗議；3 月 17 日文化大學法律系學生「送鐘」給國民大會；以政治大學學生為主所組成的「全民逼退老賊運動總部」也在 3 月 17 日召開記者會，發起全民逼退老賊的活動等等。

在學運蓄勢待發的時機，教授的態度是一個關鍵。17 日台大自由派教授決定發起「柔性罷課」，自 3 月 19 日起為期一週將上課地點改到中正紀念堂，並定名為「民主教育週」，同時有 10 位教授聯名發表給校長的公開信，要求台大實施「民主教育週」。這項消息立即傳達給 3 月 17 日下午集會的各學運團體，晚間則在廣場上正式宣布，並同時得到清大與成大教授的支持，願意與台大教授同步行動。教授的決定給予學生精神上極大的鼓舞，「民主教育週」等於在幫學運團體擴大動員的規模。³¹

3 月 17 日下午由李登輝召開包含黨政軍特四大系統首長高層會議，並成立危機處理小

²⁹ 鄧丕雲，《八〇年代臺灣學生運動史》，頁 307。

³⁰ 林美娜編，1990，《憤怒的野百合：三一六中正堂學生靜坐記實。》台北：前衛，頁 72-77。

³¹ 鄧丕雲，《八〇年代臺灣學生運動史》，頁 310。

組。晚間李登輝曾透過電視台公開談話，但不被學生接受。電視新聞並報導了廣場學生的靜坐活動，而電視報導具有將社會力向廣場集中的導引作用。在廣場生存最艱難的學運初期，社會力就有向廣場集中的趨勢，並使廣場的自主性不斷增強。³²

3月17日深夜至3月18日凌晨，廣場上的靜坐學生展開首次「校際會議」，產生決策委員會(3月20日以後改稱「決策小組」、「指揮中心」等組織架構³³)並確立了三月學運的四大訴求：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訂定政經改革間表³⁴。並出刊《廣場通訊1號》，將領導部門的決議告訴群眾，擴大靜坐的參與，以及呼籲以理性和平的態度進行參與。

3月18日中正紀念堂廣場匯聚全國各地越來越多的大學學生前來加入靜坐，並發動罷課，使得教育部長毛高文不得不出面關切參與學生而喊話，希望同學在表達意見時，訴求方式應顧慮安全、以理性方式表達。毛並針對學生展開罷課或靜坐抗議國民大會一事表「嚴重的關切」，但卻又強調教育部不會加以干涉。警方更破天荒的對集會遊行禁區內的「非法」集會者，給予不驅散的承諾。³⁵

同日，民進黨又在中正紀念堂舉行「除老賊，救國難」活動，透過政黨的動員力量使現場的民眾多達兩、三萬人。而三月學運的領導部門盡力的始學運本身與民進黨的群眾大會保持距離，首先先向廣場宣布保持隔離的決議，並表示以「自主、隔離、和平、秩序」為四大原則。在民進黨的聚眾活動進行之前學生便以做好如此的準備，而此四項原則也於日後三月學運的最高綱領，直到結束都沒有違反。³⁶當晚民進黨所辦的活動已結束，但民眾仍未全數散去，當民進黨申請時間剛過不久，鎮暴警察突然出現，若對民眾進行鎮壓勢必會波及到廣場上的學生，幸賴警政單位出面接手，才未讓鎮暴單位進駐中正紀念堂。

晚間，李登輝在官邸召開會議，商討是否前往廣場探視學生，並遣隨身親信先赴廣場探勘情勢，由教育部長轉交親筆函，內容是：「請毛部長轉告同學們 你們關心的事我都知道，我肯定的向大家保證，改革的事，政府一定會加速做，一定會盡快給大家明確的交代，天這麼冷，請大家愛惜身體，早點回家，回到學校去吧！」

到了3月19日，全國學生的抗議越演越烈，由於學運團體、學生自治組織網絡及教授在該日皆有動員學生的計畫，廣場上靜坐學生已超過3000人。至此日始，三月學運進入最核心的關鍵主旋律，全台灣都在注視廣場，創造歷史的氣氛在廣場上日漸蔓延。19日東海大學學生方孝鼎率先絕食靜坐，隨後陸續有9人加入，並發表絕食聲明。

19日凌晨教育部長毛高文與宋楚瑜驅車繞行中正紀念堂一圈，視察現場情況。19日廣場領導部門發出《廣場通訊2號》，公佈李登輝的信函內容，並針對其內容提出答覆：「我們的回應：仍堅持四個訴求目標」。³⁷

3月19日對於學生此次行動之最大意義為，該日晚間十一點廣場上的校際會議通過決定

³² 鄧丕雲，《八〇年代臺灣學生運動史》，頁312。

³³ 文宣組，《廣場通訊1號》，1990.3.18。

³⁴ 何金山、官鴻志、張麗伽、郭承啓合著，《台北學運：1990.3.16-3.22》，頁46-47。

³⁵ 鄧丕雲，《八〇年代臺灣學生運動史》，頁314。

³⁶ 鄧丕雲，《八〇年代臺灣學生運動史》，頁312。

³⁷ 文宣組，《廣場通訊2號》，1990.3.19。

以台灣原生植物「野百合」作為運動的精神象徵。³⁸其象徵意義如下：

- (一)自主性：野百合是臺灣固有種，象徵著自主性。
- (二)草根性：野百合從高山到海邊都看的到，反映了草根性。
- (三)生命力強：她在惡劣的生長環境下，依舊堅韌地綻放。
- (四)春天盛開：她在春天盛開，就是這個時刻！
- (五)純潔：她白色的純潔正如學生們一般。
- (六)崇高：在魯凱族裏，她更是一生最崇高榮耀的象徵。³⁹

臺灣野百合道盡了學生心目中的三月學運，包含了對臺灣主體性的認同（自主性）、全民的運動（草根性）、對抗不義的勇氣（生命力強）、青春的活力（春天盛開）、學生的理想道德象徵（純潔）、以及參與者生命中的榮耀（崇高）。⁴⁰

國民大會在各界的壓力下，提出資深代表於 1992 年退職案，而野百合學運經連日以來的堅持也引起國際間的矚目，留學海外生以及同鄉會的支持聲明透過各種管道送抵廣場。在社會力的介入部分，自 19 日起就開始對廣場進行表態，至今日達到最高峰。各級議會派出代表前往廣場慰問學生，但廣場部分基於超黨派原則，拒絕讓任何政治人物上台發言。

³⁸何金山、官鴻志、張麗伽、郭承啓合著，《台北學運：1990.3.16-3.22》，頁 62-65。

³⁹文宣組，〈野百合的春天〉傳單，1990.3.19。

⁴⁰鄧丕雲，《八〇年代臺灣學生運動史》，頁 320。

第三節 野百合學運的四大訴求

3月19日以「全國學生自治組織」署名的〈同學們！歷史在號召著我們！〉傳單也明確的指出廣場上學生以及此次學運的主要訴求：

1. 解散國民大會，重建一元化的國民大會制度。
2. 廢除臨時條款，重建新的憲法秩序。
3. 召開國是會議，全民共謀體制危機的解決。
4. 提出民主改革時間表，呼應民意的潮流。⁴¹

3月20日廣場上的人數不斷增加，據生活組統計，到當日傍晚達到4000~5000人，這可能是廣場學生人數最多的時候。⁴²同日上午，原本對學生行動無任何動作的行政院長李煥，指派政務委員黃昆輝與馬英九代表行政院前往探視學生。政府方面新聞稿則表示：「李登輝總統決定近日內召開國是會議，邀請各界代表參加，以處理有關憲政體制及政治改革等問題，並訂定改革時間表」，教育部將此份新聞稿傳真給各大學，期望各校呼籲學生盡速返校上課。學生部分則指派代表與府方進行聯繫，持〈邀請總統函〉前往總統府，希望李登輝能明確回應學生訴求。但後因李登輝總統並不在總統府內而沒有親自接見學生，於是邀請函便被撤回。⁴³

同日下午，決策小組向廣場報告此次行動，引起廣場學生的情緒反彈認為並未受到尊重。學生主體性增強，使指揮中心在晚上必須採由各校討論，再派代表上台陳述意見的方式，此時，領導部門與群眾間已處於一種平衡的關係。決策委員會並在晚上的會議決議擴大參與，將學生領導核心成員增加至十三名。⁴⁴此時廣場已傳聞國民黨透過救國團系統動員大量黨籍的學生滲透入廣場內，企圖影響、改變運動的走向，也因此廣場上的學生組成漸漸變得複雜且不單純，也更加深了廣場上學生的恐懼與不安。

3月21日決策委員會與五人教授顧問團⁴⁵、三人研究生諮詢小組⁴⁶討論整場學運的撤退問題，和平撤退成為與會者的共識，最後決定以見李登輝為抗爭底線，「政治談判」的概念至此進入運動的思考當中。因此由賀德芬、瞿海源先行至總統府了解李登輝的底線。

此時，學生對談判內容的訴求為：

- 一、李登輝必須具體肯定這次學運。
- 二、在國是會議中，公平邀請各界人士，深入討論國是，對於學生的訴求：廢除臨時條款、資深中央民代限期退職、訂定政經改革時間表，應提出有效解決方案。
- 三、全體廣場學生於總統先生明確可接受以上兩項要求，即結束靜坐活動，否則將堅持原則繼續抗爭到底。⁴⁷

⁴¹ 全國學生自治組織，〈同學們！歷史在號召著我們！〉(1990年3月19日)，收入林美娜編，憤怒的野百合：三一六中正堂學生靜坐記實。

⁴² 鄧丕雲，《八〇年代臺灣學生運動史》，頁321。

⁴³ 何金山、官鴻志、張麗伽、郭承啓合著，《台北學運：1990.3.16-3.22》，頁69-70。

⁴⁴ 鄧丕雲，《八〇年代臺灣學生運動史》，頁322。

⁴⁵ 即賀德芬、瞿海源、張國龍、鄭春棋、夏鑄九。

⁴⁶ 即曾旭正、吳介民、李建昌。

⁴⁷ 何金山、官鴻志、張麗伽、郭承啓合著，《台北學運：1990.3.16-3.22》，頁75-76。

學生的訴求總括而言即為爭取學運的正當性與實現四大訴求。李登輝對於三點要求全部答應，並將第二點的資深中央民代限期退職改為國會全面改選，但因對於前往廣場與學生談話一事有安全顧慮，所以李登輝希望在總統府接見學生代表。由於賀德芬、瞿海源兩人至總統府一事除決策小組外，其餘在廣場上的學生都不知情，因此後來造成學生群眾的反彈，而因發直接民主的出現。⁴⁸在一度要求決策小組辭職以示負責後，廣場學生仍挽留了他們，在此同時整場學運的決策權似乎又回歸了廣場學生身上，在經過各校代表上台表決後通過四點要求，同意派學生代表至總統府協商：

- 一、接受學生們對民主憲政決心與情操及學生所提四項嚴肅要求，並對全國民眾發表。
- 二、在總統就職前召開國是會議。
- 三、全體在廣場上學生同意上述兩項要求如能被接受，立即結束靜坐，如果沒有，將持續採取抗爭。
- 四、為確保學生主張能獲得執行，他們將組成一個校際聯合組織，持續監督國是會議，必要時他們將號召全國學生再度組織動員。⁴⁹

同日晚間，學生代表與教授賀德芬、瞿海源前往總統府與李登輝面對，李登輝當場面對廣場四大訴求的答覆是：解散國民大會及廢除臨時條款，並非總統職權，這些會在國是會議中討論，而國是會議召開的時間可能比學生期待的要早，另在總統就職時會宣布改革時間表，並肯定學生的愛國情操。⁵⁰

雙方溝通之間顯然的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學生所提問題與李登輝總統的認知之間也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差異性，雙方的協商在學生代表范雲離去的要求下結束。

稍晚，會談錄影帶送抵廣場，在播映結束後已無人能夠決定廣場的未來，去留皆須由每一位參與者自行決定。學生主體性在此抵達高峰，每一個人都是廣場的主人。3月22日凌晨，43名絕食團學生提出撤離廣場的建議案。再經由各校討論過後，於二時五十分召開校際會議，結果有22所學校同意撤退，唯淡江大學反對。野百合學運的最後一夜廣場上將近有7000名學生。

3月22日早晨，指揮中心正式宣布撤退聲明：〈追求民主永不懈怠〉⁵¹，就此結束為期六天的野百合學運。

⁴⁸鄧丕雲，《八〇年代臺灣學生運動史》，頁327。

⁴⁹何金山、官鴻志、張麗伽、郭承啓合著，《台北學運：1990.3.16-3.22》，頁77-80。

⁵⁰鄧丕雲，《八〇年代臺灣學生運動史》，頁331。

⁵¹〈我們的聲明——追求民主永不懈怠〉，1990.3.22，收於林美挪編，1990，《憤怒的野百合：三一六中正堂學生靜坐記實。》台北：前衛，頁142-143。

第四章 結論

解嚴後的學生運動團體普遍的針對台灣社會民主自由化的相關議題展開作為與積極的行動，而這些學運團體的行動也與 1980 年代末期台灣社會的情勢與未來發展習習相關。在探討野百合學運引爆的諸多因素裡，自然不可忽略校園外的社會與校園內的環境因素對野百合學運的生成所造成的影響。

從解嚴後校園外部環境之分析中可以發現，時代與社會背景的轉變對於野百合學運之醞釀和生成有莫大的影響力，從經濟環境而言，解嚴後的台灣社會經濟高度發展，為追求與經濟能力發展相符的生活品質上的提升，意即使價值期盼與價值能力兩者間的差距能夠拉近，解嚴後的學生運動與社會運動便為追求生活品質與社會整體環境的提升而大量萌生；從社會環境而言，台灣社會多元化的歷程，即因經濟的發展而使得解嚴後的台灣無論是在物質生活、社會結構抑或是價值觀與內涵上皆產生的相當大的差異，社會變遷改變了原有的社會環境，而社會變遷也因此間接的提供了社會運動的環境基礎；從政治環境而言，解嚴後的台灣正處於一政經轉型階段，而為回應人民在價值期盼上的政治參與渴求以及社會改革能迎上價值能力的提升，政府的政策相對而言更趨於開放，在政治力、社會力以及法律、政府的規範彼此之間相互擺盪並使學生運動的發生更具實踐的可行性。

從解嚴後校園內部環境之分析中可以發現，野百合學運的發生點在歷經解嚴後約三年，經如此一段時間的醞釀，較解嚴前的學生運動而言累積了更為充足的學生運動經驗，從動員、組織、訓練至運動的開展，從解嚴後初期的小規模學運至不斷的壯大與相匯聚，歷經 1980 年代的各式議題，自初期針對校園內黨化教育、審稿制度、國民黨政府滲入校園進行思想監督等的議題，擴及至中後期與社會議題以及脈動產生連結之議題如反杜邦、國民大會代表正當性問題、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等的學運導向，都可視為野百合學運潛在之醞釀以及推力。至野百合學運時校園內學運運作能力相對解嚴初期已更臻成熟，即在 1990 年結合較具爭議且影響範圍擴及較大的社會議題，如國民大會代表長年未經改選並且濫權、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尚未解除等問題，而於焉爆發台灣學生運動史上規模甚巨的一次學生運動事件。野百合學運試圖抵抗國民黨長期以來對台灣社會的控制，更成功的喚醒了多數學生對於民主化的憲政體制追求的覺醒以及反威權、反壓迫的意識。

總結而言，解嚴後學生力量的蓄積以及台灣校園與台灣社會內所存在的種種問題，這樣的潛在環境提供了野百合學運出現與發展之背景，以致野百合學運是為一自解嚴後累積了數年的運動經驗、學生力量、社會與校園問題三者結合進而產生的大規模學生運動。學生運動以學生族群為主的主體性、無涉任何利益糾葛與高度的理想主義色彩，以學生運動的形式呈現一個時代裡台灣社會普遍大眾和學生對政府久未經改革進而產生的種種問題的不滿及反對力量的集結，是一個推斷最有可能在該時間點使野百合學運爆發而出的結果。而這個結果更與前述的台灣解嚴後校園內外環境關係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性，從政治環境、經濟環境、社會環境至校園內學生運動社團的興起與組織、校園內部的風氣與學生活動的醞釀等因素，皆為造成野百合學運的諸多因素。

野百合學運在短時間內吸引了全國聚焦性的關注與許多學生和人民以各種形式的參與，野百合學運的一個相當重要的意義，即是啓迪了在當時所處解嚴數年的台灣社會底下，藉由學生的出面登高一呼而對台灣社會情況以及政府政策作為有進一步的關心和了解，並且提出批評和建議，普遍性的興起要求政府改革之呼聲，使學運的浪潮擴及全國，成為台灣邁向 1990 年代一極為重要且具有指標性意義的重大事件。

野百合學運並發揮極大的影響力，使台灣的民主自由發展有了開創性的進步與革新，也使野百合學運在台灣學生運動使裡扮演了一個相當重要且無從取代的角色。

參考文獻

(一)博碩士論文

- 孟繁忠，《臺灣地區解嚴後學生運動之研究》，桃園：國立警察大學行政警察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 林仁傑，《一段跨時代的故事：臺灣學生運動史研究（1920-1994）》，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 徐文祥，《臺灣地區學生運動之研究（民國 38-83 年）》，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博士論文，1995。
- 彭琳淞，《政府遷臺後臺灣學生運動變遷之探討—以四個重要因素之互動關係》，臺中：東海大學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
- 郭凱迪，《學生運動與臺灣自由民主發展之研究（1981-1992）》，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二)專書

- 何金山、官鴻志、張麗伽、郭承啓，《臺北學運：1990.3.16-3.22》，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0。
- 何榮幸，《學運世代—眾聲喧嘩的十年》，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01。
- 范雲編，《新生代的自我追尋—臺灣學生運動文獻彙編》，臺北：前衛出版社，1993。
- 李筱峰，《臺灣史 100 件大事》，臺北：玉山社，1999。
- 林美挪編，《憤怒的野百合：三一六中正堂學生靜坐抗議記實》，臺北：前衛出版社，1990。
- 林時機，《大學改革與大學法》，臺北：正中書局，1991。
- 林康，《「學運」的歷史悲劇》，臺中：臺灣日報，1986。
- 洪三雄，《烽火杜鵑城：七〇年代臺大學生運動》，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3。
- 徐正光、宋文里編，《臺灣新興社會運動》，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90。
- 張茂桂，《社會運動與政治轉化》，臺北：國家政策研究中心，1990。
- 新生代，《蕃薯地上的反叛種子：第二屆學生運動研討會.1994，臺北篇》，臺北：前衛出版社，1994。
- 楊渡，《強控制解體》，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8。
- 楊澤主編，《狂飆八〇》，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9。
- 台大自由之愛編輯群編，《自由之愛--台大學生「自由之愛」運動記實》，台北：南方，1987。
- 鄒景雯，《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臺北：印刻出版公司，2001。
- 鄭鴻生，《青春之歌—追憶 1970 年代台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1。
- 鄧丕雲，《八〇年代臺灣學生運動史》，臺北：前衛出版社，1993。